

從臨摹到反思——

我國社會科學博士對歐美知識與體制的回應

石之瑜 主編

翰蘆圖書出版有限公司

C4
2008/

從臨摹到反思：

我國社會科學博士對歐美知識與體制的回應

石之瑜 主編



翰蘆圖書出版有限公司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從臨摹到反思：我國社會科學博士對歐美知識與體制的回應 / 溫洽淦等著；石之瑜主編.-- 初版.--
臺北市：翰蘆圖書，民 94

面； 公分

ISBN：986-7522-28-1（平裝）

1. 社會科學－論文，講詞等

507

94020317

從臨摹到反思：

我國社會科學博士對歐美知識與體制的回應

著作權所有 ◆ 翻印必究

主 編 / 石之瑜

著 作 人 / 溫洽淦、梁錦文、賴祥蔚、鄧志松、石佳音、張佑宗、
莫大華、楊鈞池、王信賢、張弘遠、李宗義、戴政龍

發 行 人 / 周 明 德

出 版 者 / 翰蘆圖書出版有限公司

地址：台北市重慶南路一段 121 號 5F-11

電話：2382-1120 • 2382-1169

傳真：2331-4416

E-mail:hanlu@hanlu.com.tw

http://www.hanlu.com.tw

郵撥帳號 / 15718419 翰蘆圖書出版有限公司

印 刷 者 / 金 華 打 字 行

電話：2382-1169 • 2382-1120

初版日期 / 94 年 12 月

定 價 / 300 元

《本書如有缺頁、裝訂錯誤，請寄回調換》

政治科學集刊 1

從臨摹到反思：我國社會科學博士對歐美知識與體制的回應

集刊主旨

政治科學集刊由國立台灣大學政治學系發行，主要刊載本系舉辦學術研討會之會議論文，所收錄文章均事先徵得撰稿學者同意送交學術審查，包括送審、修正與答辯、再送審且獲得通過。每期集刊由負責會議主辦教授擔任主編，依照文章性質，分成研究論文與研究札記，其中論文須經由兩位評審審核通過，札記須經由一位評審審核通過。

前 言

在我國獲得的社會科學博士學位，與在歐美國家獲得的博士學位相比，就所修習的知識內容而言，兩者皆著重歐美的社會科學理論方法，教學與研究且均大量仰賴歐美的文獻。然而，兩者的際遇卻向來不同，乃至於工作機會、研究資源、生涯規劃與社會關係均所差異。舉凡當前一般社會科學期刊的編輯與審核，學術機構的升遷聘任，泰半由留學歐美返國的同仁所擔任，相形之下，持有我國社會科學博士的同仁，便處於一個特殊的研究教學環境中。在這樣一個既有相同、又有差異的背景下，國立台灣大學政治學系舉辦「從臨摹到反思：我國社會科學博士對歐美知識與體制的回應」研討會針對此一知識社會現象加以探討。

會議採取徵文方式，徵文內容如下：

誠徵在我國高等教育機構獲得社會科學相關領域博士學位之同仁，在上述旨趣範圍內，提交論文計畫大綱，探討關於自身研究教學經驗中所涉及的社會科學知識論、社會科學本土化、研究與教學方法論、特定歐美社會科學理論、特定學術領域或次領域、學術體制、學術社群、跨國學術交流、國際會議的內容與形式、社會科學各領域的教學及其他相關課題，特別歡迎反思與批判觀點。大綱提交後，由研討會之籌備管理委員會聘請專家進行審核，就其中遴選八至十篇。俟研討會進行同時，每篇論文並另邀學者專家二人擔任評論，撰稿人得依據評論意見確實修正，並通過再審核後，由籌備管理委員會安排正式出版。

應徵論文大綱注意事項：

- 一、申請人應具備國內社會科學相關領域博士學位。
- 二、請備妥論文大綱一份，寄台北市徐州路二十一號台灣大學政治學研究所【從臨摹到反思】研討會收，或註明主旨後寄 politics@ntu.edu.tw。
- 三、大綱內容應包括姓名、學位、所屬研究機構、職稱、論文題目及論文大綱。大綱以五百字以內為宜，並應在申請人判斷適當的情況下，分

2 從臨摹到反思：我國社會科學博士對歐美知識與體制的回應

別包含論文標題、緣起、重要性、研究架構與研究方法等內容。

四、獲得遴選參與研討會論文寫作者，象徵性地發給致謝酬新台幣一萬元。

五、研討會預定在民國九十三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於徐州路二十一號台灣大學社會科學院召開。

六、申請截止日期為九十三年九月十日，並於九月二十四日前通知申請人。

七、以上如有未盡事宜，將在台灣大學政治學系網頁公告之。

目 錄

前 言	1
對當前學術體制與觀念的省思	
關於美國中國研究機制的意識形態反思－以政治文化研究 途徑為例	溫洽溢 3
國際化？去國際化？我國學術評鑑制度之反思	梁錦文 31
新聞自由的臨摹與反思	賴祥蔚 49
對政治學本土化的知識論探究	
政治學本土化與台灣的民粹論述：一個韋伯觀點的評析	鄧志松 73
於無聲處聽驚雷：試論何謂「好的本土社會科學研究」	石佳音 117
對我國政治學教學體制的檢討	
學術扎根或販賣文憑？：台灣本土政治學博士的訓練與就業 狀況分析	張佑宗 151
國軍培育國內政治學博士教育的發展與回應－政戰學校政治 研究所博士班的觀察	莫大華 175
典範的學習？或典範的創新？－如何選擇「適當的」政治學 門教科書之省思（研究札記）	楊鈞池 199
對中國研究理論的修正與應用	
組織社會學與當代中國研究評述：反思與實踐	王信賢 213
「中國研究」在台灣：研究體制的發展與變遷	張弘遠、李宗義 251
文武關係研究的本土發展與回顧（研究札記）	戴政龍 283

對當前學術體制與觀念的省思

溫洽溢 / 關於美國中國研究機制的意識形態反思
— 以政治文化研究途徑為例

梁錦文 / 國際化？去國際化？我國學術評鑑制度之反思

賴祥蔚 / 新聞自由的臨摹與反思

關於美國中國研究機制的意識形態反思 ——以政治文化研究途徑為例

溫洽溢

埃及學是埃及學，不是埃及。

薩依德

壹、前言

美國中國研究領域的顯著特色之一，即在於其研究方法上所強調的「社會科學化」，亦即援引社會科學的各項理論途徑，來分析中國各領域的課題。在這股社會科學化的潮流過程中，最重要的轉折、也是這股社會科學化潮流的濫觴，就是美國的中國研究學者把政治學領域的「政治文化」(political culture)概念，應用在中國研究領域上(Harry Harding, 1984: 284-307; 鄭宇碩、羅金義, 1997: 401-434)。

概括而論，對於政治行為的解釋不外乎「結構」與「文化」兩種途徑(Bruce J. Dickson, 1992: 103-117)。「結構」取徑強調「常態性的行為模式，尤其是指正式或非正式組織中的常態性行為模式。」「文化」取徑，則轉而重視信仰、習慣、價值觀如何形塑個人在政治生活領域中的行為特質。事實上，儘管在美國政治學界，支撐政治文化研究途徑的「行為主義」(behaviorism)方法雖已趨於日薄西山，但是政治文化研究的取向依然在政治學者之間盛行。例如，帕特南(Robert D. Putnam)的名著《使民主運轉起來》(*Making Democracy Work: Civic Traditions in Modern Italy*)，即是阿蒙(Gabriel A. Almond)與維巴(Sidney Verba)《公民文化》(*The Civic*

Culture: Political Attitudes and Democracy in Five Nations) 分析架構的延續。帕特南這本書即建立在托克維爾 (Alexis de Tocqueville) 分析美國民主政治的洞見上，以「社會資本」(social capital) 對集體行動的影響，闡釋義大利北部公民傳統驚人的歷史延續性 (帕特南，2001)。

同樣地，儘管在當今的美國中國研究領域，結構制度面的分析大行其道，但美國中國研究學界對於文化取向的關注也從未消聲匿跡；反之，還與結構制度典範鼎足而立，形成典範競逐之勢。例如，中國社會中的「關係 (guanxi) 網絡」一直是當今美國中國研究領域的重要課題，其影響作用遍及政治、經濟、社會各個領域，同時其存在之韌性，也不因朝代更迭、政權輪替、社會主義之制度轉型而消失。然而，在美國中國研究領域，有關關係網絡的形成因素，也存在著以魏昂德 (Andrew Walder)、戴慕珍 (Jean C. Oi) 的結構主義、理性選擇典範 (Andrew G. Walder, 1986; Jean C. Oi, 1989)，以及法蘭西斯 (Corinna-Barbara Francis) 文化取向 (1996: 842-843) 之間的爭論。除此之外，在「派系政治」的論述方面，也存在類似之「結構」與「文化」取向兩者的論辯。¹

本文即以索樂文 (Richard Solomon) 和白魯恂 (Lucian Pye) 的政治文化研究為例，闡釋他們二人在援引政治文化研究來研究中國問題時，往往預設對中國文化傳統的特定解釋，而這種解釋實蘊含著「東方主義」(orientalism) 的二元架構，深深烙印了歐洲中心主義歷史觀的色彩，一方面既誤解中國文化，另一方面也簡化了對西方政治哲學傳統的認知。其次，本文也要進一步說明，白魯恂與索樂文的「中國觀」，並不是他們兩人所特有；勿寧說，他們兩人的中國觀，乃是延續在西方世界自孟德斯鳩、亞當斯密、黑格爾以降，乃至於費正清 (John King Fairbank)、列文森 (Joseph R. Levenson)、等美國中國歷史研究學家一脈相承之中國「停滯論」的預設上。再者，這種對中國歷史傳統的解釋，根據知識社會學的分析，是與美國學術社群的主流典範和美國的國家政策契合。

¹ 詳見 Lowell Dittmer (1995: 1-53)。

貳、中國研究的政治文化途徑－文化與政治學的對話

根據阿蒙（Gabriel A. Almond）與包威爾（G. Bingham Powell, Jr.）的經典定義，所謂政治文化，意指一個民族在特定時期流行的一套政治態度、信仰與感情，而這類政治文化是由該民族在過去與現在的社會、經濟、政治活動過程中所形塑而成的（1991：105）。再根據羅森邦（Walter A. Rosenbaum）的進一步闡釋，我們可以從兩方面來理解這種政治態度以及由此所形成的政治生活。首先，若是吾人關注於個人層次的分析，那政治文化基本上是以心理過程為分析焦點。它包括個人主觀上對政治體系之基本要素和態度取向的所有表達方式，以及個人對於構成社會之基本政治秩序的符號、機構規則的態度和觀感，以及對於這種政治秩序構成要素的反應。所以，若是從個人的層次來理解，政治文化所要探討的就是一個人的社會心理面向，亦即個人與政治體系之間的關聯性，以及這種關聯性又是如何影響個人的行為。其次，若是從體系的層次來討論政治文化，那政治文化係指人民對於政治體系基本要素的集體態度取向（羅森邦，1985：79）。

由是觀之，政治文化是一種關於歷史與政治的綜合研究，尤其是注重兩者之間的互動、交融關係。以研究重心而言，歷史研究著重於彰顯傳統文化、價值觀的形塑與演進的歷程；政治研究則是體現這種傳統文化、價值觀的行動模式之中，顯現權力的結構與運作方式。但是在實際的歷史中，歷史與政治的發展卻要是交織一起，難以切割的，而具體體現在個人或集體外顯的政治心理素質和行為特質上。

根據上述的定義與推論，我們可以把美國中國研究領域在援引政治文化研究模式時，大致上歸納為三種類型（Amy Auerbacher Wilson et al., 1983：51-68）。

其中最廣為人知的、目前仍被廣泛應用於研究中國政治文化的分析途徑，莫過於西方學界所謂的「漢學」研究傳統。諸如牟復禮（F. W. Mote）、狄百瑞（W. M. Theodore de Bary）、史華慈（Benjamin I. Schwartz）這類知名的美國漢學家，他們的分析方法是通過對中國古典經籍文本的詮釋，建構他們的政治文化論述。這類漢學家主要關切的是中國歷史文化中的

「大傳統」。根據這類政治文化的研究取向，西方漢學家在分析時其實暗含了幾個基本假設前提。首先，就漢學家而言，以儒家所代表的「大傳統」的世界觀，是整個中國社會價值體系的內在核心。其次，與前述假設相關的是，儘管儒家的經典及倫理所規範的「大傳統」雖然會隨著時間的演變而遭受衝擊，但整個帝國時期中國文化的本質仍是根深蒂固的。第三，由前述兩點可知，包括儒生及士紳在內的知識分子，既是文化的創造者、捍衛者，也是主要的傳承人。

然而，雖說我們必須在社會結構的規範價值體系之中來觀照社會行動，才能賦予社會行動的應有意義；但我們也不能忽略必須超越文本而通過對社會的解析，才能理解社會規範受到尊崇的程度。同時，社會規範也不全然由知識分子等菁英階層以文本論述的方式為之，而是通過日常生活的實踐而內化為群眾的常態行為。據此，漢學研究的基本假設，文化形式是菁英階層由上而下的建構，這也就忽略了常民百姓在文化形構中的意義。

為了救濟漢學研究菁英趨向的「詮釋途徑」，有關中國政治文化的第二種研究取向，乃由研究者直接深入中國社會進行田野調查。這種研究取向一反漢學「詮釋途徑」的研究假設，其關注的重心不在於中國傳統典籍的理論假設，不在菁英階層的價值觀，而是在於社會的實踐層面。這類研究取向深入中國社會的底層從事實地調查，他們的觀點傾向於描述性的，缺乏系統性架構。例如，這類學者往往認為，中國人行為模式的特點是重視面子，集體導向，依賴權威。

美國中國研究領域的第三種政治研究方法，是社會科學家經常採用的心理分析研究方法，承襲佛洛伊德、艾立克生等人的心理分析理論對社會科學的深刻影響，強調中國人在兒童階段的社會化過程，認為兒童階段的心理發展決定了日後的人格結構、人際關係模式，以及對外在環境的控制。這類研究取向的關注焦點，在於中國的「大傳統」、「小傳統」是如何通過家庭的「社會化」過程，而內化為中國人特有的行為模式。

在中國研究領域裡，雖然可以區分為這三種政治文化的研究取向，但值得注意的是，學者在實際研究上，卻又往往交錯援引這三種分析途徑，而難以分殊歸類。以《亞洲人的權力與政治－權威的文化向度》（*Asian*

Power and Politics – The Cultural Dimensions of Authority) 一書為例，白魯恂在這本書中從政治文化的途徑來探討中國人的權力觀時論及，中國人權力運作最重要的特點在於權力的一元化，而這種特定觀點源自於儒家思想以父親作為家庭之中終極權威角色的行為模式，使得中國人往往會過分誇大偉大領導人——不管是皇帝或者是委員長、主席——行為的示範作用。中國人這種行為模式，根據白魯恂的心理分析，主要是因為中國人在兒童階段的經驗，在父母親的悉心照料之下養成某種獨特的安全感（sense of security），而使得成年之後的中國人往往依賴於家父長般的權威人物（1985：185）。

根據前述對政治文化定義，以及對美國中國研究領域在援引政治文化研究途徑時的分析趨向，大致上可以了解，政治文化研究是一種融合政治學、歷史、社會學、心理學的研究模式。而在中國研究領域方面，政治文化研究的分析提供了學者有關政治學研究與包含獨特之文化、傳統在內的中國歷史分析，兩者之間的對話空間。惟因如此，對中國研究領域而言，政治文化研究能否作為一種理解的洞見，其關鍵之一就在於對包括中國獨特文化傳統在內之廣義中國歷史的認識和解析。本文試以白魯恂與索樂文師徒對中國的分析為例，說明美國中國研究領域內的政治文化分析，對於中國歷史傳統的理解，其實往往蘊含著「東方主義」（orientalism）的二元架構，深深烙印了歐洲中心主義歷史觀的色彩，一方面既誤解中國文化，另一方面也簡化了對西方政治哲學傳統的認知。同時，本文也要進一步說明，白魯恂與索樂文的「中國觀」，並不是他們兩人所特有；勿寧說，他們兩人的中國觀，乃是建立在西方世界自孟德斯鳩、亞當斯密、黑格爾以降，乃至於費正清（John King Fairbank）、列文森（Joseph R. Levenson）、等美國中國歷史研究學家一脈相承之中國「停滯論」的預設上。

參、中國研究領域的知識社群 ——知識論與社會學的對話

政治文化研究、乃至於其背後所預設的行為主義模式（behaviorism）

如何能主宰美國對中國這樣異國文化的詮釋和描述，而蔚為美國中國研究領域的主流典範之一，廣泛地被美國中國研究學界所接受？這其中牽涉的不只是解釋效度的知識論問題，它同時還與知識作為「知識社群」之集體而非個人實踐行動的產物，必然與語言溝通和社會互動能力息息相關。換言之，誠如伯恩斯坦(Richard J. Bernstein)針對這種對知識社會學的說法：「這種新的理解方式的關鍵之處，在於合理性的對話模式，它強調這種合理性的實踐性與共同體的特徵，其中存在著選擇、商議、闡釋、明智的權衡和『普遍標準』的運用，儘管也有可能在哪種標準更貼切、更重要的問題上無法達成合理的共識。」(1983：172)孔恩(Thomas S. Kuhn)援引「典範」(Paradigm)概念，突出知識發展的「革命性斷裂」，藉以駁斥巴伯(Karl Popper)的「批判積累說」，開創性地闡釋知識生產的實踐性與社會學意義。

根據孔恩的說明，所謂「典範」有兩層意義：「一方面，它代表一特定社群成員所共享的信仰、價值與技術等構成的整體。另一方面，它指涉那一整體中的一種元素，就是具體的問題解答，把它們當作模型或範例，可以替代規則作為常態科學其他謎題的解答基礎。」直言之，孔恩所謂的典範，意指「一套科學習慣，科學家即根據這樣的習慣來解決知識上的難題，所以這類習慣可以是知識的、語言的、行為的、技術的」。當典範形成之後，即進入到「常態科學」(normal science)時期，即「以一種或多種以往科學成就為基礎的研究，某一科學共同體公認它在一定時期裡從事進一步研究的基礎。」對於孔恩而言，科學典範的轉變是發生在新生的異常現象違逆的典範的基本假設，而針對這異常現象所提出的新理論又為科學社群共同接受，使科學家能夠援引新的理論更廣泛地解釋或者更正確地解釋先前已知的現象。所以，典範的轉變是發生在當能夠整合異常現象的新理論為科學社群所共同接受(孔恩，1991：117-118)。

在美國的中國研究領域方面，事實上也出現了典範競逐的現象。亦即，美國的中國研究領域一方面繼續賡續傳統歐洲「漢學」的取向，專注於中國古典典籍的研究與演繹，同時也出現中國研究「社會科學化」的重大轉折，以漢學研究的成果為基底，並朝向科技整合趨勢的「區域研究」(area studies)典範。這其中關鍵的人物之一，就是美國知名的中國歷史

研究學者、素有「學術企業家」之譽的費正清（埃文斯，1995：222-227）。

依據孔恩的論點，典範危機是發生在既有典範無法解釋與理論悖逆的反常現象。但與自然科學不同的是，社會科學領域內的典範危機和革命性的轉變，往往並不是緣於既有的理論無法解釋悖常的現象，而是由於生活世界發生危機。事實上，「主要理論大都誕生在危機時刻，而不起源於常態之下」，同時，「採取了批判現有的社會，要求重新恢復秩序的形式。」所以，似乎唯有生活世界發生危機的狀態，才會促使社會科學家重新審思他們的理論架構與他們所處生活世界的關係。根據費正清的自傳所述，他正是有感於冷戰期間國際局勢和國內環境的不變，例如中共加入韓戰的戰局、乃至於越戰的爆發，以及美國國內有關「丟失中國」的爭論和麥卡錫主義的恐怖氣氛，而認為有必要重新認識、定位中國。但這方面的知識需求是傳統漢學研究成果所無法滿足，必須另闢蹊徑。於是，費正清即以哈佛大學的東亞研究為基礎，呼籲集中各門社會科學，聚集各類社會科學研究人才，對中國進行跨學科、綜合性的研究（費正清，1991：433-478）。

又如前述孔恩的分析，典範的概念不僅止是知識論的問題，它還是有關知識如何被鑲嵌在科學社群的探討上。擁有典範的知識社群，一方面左右了研究的方向、議題與解答問題的方法，另一方面也提供知識生產者的評價和報酬。孔恩的知識社會學指出，知識的力量是無法與存在於知識社群之中所共享的有形、無形機制切割開來的。針對這種知識生產的社會實踐面向，馬立博（Robert Marks）曾在《近代中國》（*Modern China*）期刊上撰文陳述學術機制如何支配中國研究知識的生產，審思美國的中國學術社群如何制約、形塑中國研究領域的典範（1985：477-506）。

根據馬立博的分析，自然科學典範的運行是大體由科學家社群本身來承擔，但是社會科學家往往更加依附於國家機器之上，或通過大學、專業雜誌、特殊的協會、基金會等學術機制，所以社會科學的典範不僅是一種知識的論證與反駁，同時也攸關知識權力的運作。誠如傅柯（Michel Foucault）對「論述社群」（*society of discourse*）的分析，「在每個社會裡，論述的製造會受到某種程序的控制、篩選、組織和重分配，而這些程序的作用在於消除論述的危險性，並控制論述所產生的偶發事件。」其中，論述社群即是存在於社會裡眾多控制論述原則當中的一種，它保存或製造

論述，目的是「令論述在一封閉的空間流傳，且根據嚴格的規則來分配它們，而語言主體卻不會因此種分配而被剝奪了權力。」（許寶強、袁偉，2000：1-15）馬立博即引用「圈地」（enclosure）這個概念，來形容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美國中國研究在形塑中國圖像時，知識與權力兩者的彼此交融與強化。

馬立博認為，戰後美國中國研究已經成為美國對外關係理論總體架構下的一個組成部分，而淪為解釋美國國際關係行為角色的傳聲筒。事實上，就連費正清本人亦不避諱美國中國研究學界這樣的角色：「一九五四年以後展開的美國對中國問題的研究是一項有關國家政策的活動。……隨著我們在哈佛和其他研究中心的教育和研究工作的進展，這一點也日益明顯，即我們在創建一個國家所需要的學術團體和教師隊伍。這一設想並沒有因為我們後來在越南的經歷而放棄，相反卻因此而進一步加強了。」

（1991：433）根據馬立博的分析，造成這種圈地效應的原因有三：首先，第一、二次世界大戰及戰後對全球政治的衝擊，賦予這種圈地效應合法化；其次，四〇年代「福特基金會」（Ford Foundation）的重組，挹注了中國研究領域圈地效應必要的資金和背書²；再者，五〇、六〇年代美國大學的急遽擴張，也為中國研究領域的圈地效應提供了設備與人員。國家機器、基金會與大學之間互動的結果，在學術社群裡建構了與世隔絕的「學院事業」，主導、控制了研究的目的、研究的主題、研究時所用運的方法，並防止研究的偏差行為。例如，在福特基金會的資助下，馬立博認為，「亞洲研究學會」（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AAS）便成為學院事業圈地化的有效工具。

同時，馬立博也指出，社會科學典範除了須從學術控制機制取得權力，還必須與主流的社會思潮契合。馬立博即以施堅雅（G. William Skinner）的中國地方市場模式為例，其理論模式本出自以德國為研究對象的「核心區位理論」（central place theory），應用在中國研究社會經濟結構的研究時，都有一個共同的假設前提：亦即市場是一種客觀的力量，人無法避免地只能被動回應市場機制的力量。基本上，這樣的研究假設反映

² 有關福特基金會與美國中國研究之間的關係，詳見韓鐵（2004）。